



第8期（总8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宣纸上的北大精神——甲午校庆书法三人行”开幕	4
北大爱心社启动“爱心万里行”活动	5
北京大学喜获“京华杯”北大、清华棋类桥牌友谊赛八连冠	6
平民学校“知校爱校，圆梦中华”主题活动走进北大红楼	8
守望经典 阅读精品：第十一期博雅出版论坛北大开讲	9
伏牛堂的创业之路——北大平民学校举办第九期结业讲座	11
第六届“地球·公民·传媒”论坛举办	12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北京大学”讲座	15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一行到北大六院调研	16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北京全球健康论坛”在北大召开	16

■ 网教之声

浅谈现代远程教育的评价与期待	19
从理想到现实：在线教育重建教学管理体系	24

■ 北大人物

宿白：此中无限兴 考古可醉人（下）	26
王瑶：最有精神魅力的人文学者	32

■ 北大学者谈读书

俞平伯：读书的意义 ----- 35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 ----- 37

■ 好文共赏

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 43

美国大学课堂的契约精神 ----- 52

■ 史苑钩沉

燕南园 60 号的家族记忆（上） ----- 55

鲁迅设计北大校徽：一半哀伤的脸 一半哭泣的脸 ----- 58

■ 大美北大

静园 ----- 63

塞万提斯像 ----- 65

■ 学员心声

梦里话 ----- 66

我的中国梦 ----- 67

编辑寄语

6月是期末考试季，期末考试是对学员一个学期学习效果的反馈与评价。网络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评价网络学习的学习效果，如何改变现有的考试方式，使之更符合网络教育的特点，也是每一个网教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本学期北大现代远程教育的期末考试做了一些调整，增加了开卷考试科目。本期的网教之声栏目选了苏州学习中心赵杨的文章，谈的就是现代远程教育中的评价与期待。

7月，又一批学生将要毕业。今年北大继续教育学院将迎来一批优秀毕业生代表参加毕业典礼。期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北大学子，我们在北京等着你。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郑鹏、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曾玉芬、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吴晓风、李文文

新闻动态

“宣纸上的北大精神——甲午校庆书法三人行”开幕

北京大学 116 年校庆之际，张国有、陈洪捷、牛耕耘三人以“宣纸上的北大精神”为主题，用 116 幅书法作品来书写北大精神，用这种方式向母校华诞致敬。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致辞

书法展开幕式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百余位各界朋友莅临现场。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称这次展览是今年校庆的重要部分，是献给北大的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为师生学习和践行北大精神树立了一个榜

样。北京大学书画艺术研究会会长张振国教授给予展览高度的评价，认为此次展览一定会载入北大的历史之中。90 岁高龄的著名书法家杨辛教授也高度赞扬了本次书法展，认为这是一次艺术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书法展览。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彦、常务副校长柯杨、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严纯华院士，以及迟惠生、岳素兰、林钧敬等老领导，林钧敬还当场挥毫，为书法展开幕题词“纸上存精神，传统育新人”。浙江绍兴蔡元培联谊会秘书长曾绍晖、蔡元培故居馆长张大国等也专程赶来参加开幕式。参会的各位领导和师生都认为这是一次学习北大精神、传播北大精神的创新性书法展览。



展厅现场

这次书法展览其意义不仅在于书法，而且在于对北大精神的诠释。书法展的前言写到，北大精神不一定写在标语上，挂在墙上。学者们的一言一行，往往就流露出北大的精神。学者们有严肃的著作，有生活的感悟，有做人的信念，有光荣与梦想，有欢乐和痛苦，从中都可以感受北大的传统，体悟北大的精神。这次展览正是用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来表现北大的精神，使北大精神得到艺术的呈现。通过书法，回顾波澜壮阔的北大历史；通过书法，进入丰富多彩的北大精神世界；通过书法，感受北大历久弥新的精神。作品的内容涉及的

学者都是北大人耳熟能详的人物，如严复、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蒋梦麟、曾昭抡、汤用彤、李四光、季羨林、江泽涵，周一良、孟二冬等。作品内容有俗有雅、亦庄亦谐，观赏这些作品既是艺术享受，又能勾起观众对北大百多年历史中许多片的回忆。习近平总书记 5 月 4 日考察北大时勉励师生的话语，如“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等也纳入到了展品之中。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北大爱心社启动“爱心万里行”活动

2014 年 5 月 9 日下午 3 点，北京大学爱心社“爱心万里行”暑期社会实践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召开，标志着北大爱心社的品牌活动“爱心万里行”正式启动。

在播放了历年爱心万里行的视频之后，爱心社社长邓颖对爱心社以及“爱心万里行”作了简要说明。据她介绍，北京大学爱心社成立于 1993 年，是中国高校第一家由学生自发成立的志愿服务

社团。十年多来，社团不断发展壮大，坚持从事儿童、助残、校园、护老等众多类型的爱心活动。“爱心万里行”则始于 1995 年，至今已走过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社会调查、初高中交流和支教活动。

北京大学校团委学生团体部张天然老师、山鹰社乔菁同学以及三次参加过“爱心万里行”魏然同学也依次发言。

此外，“爱心万里行”还收到了北大孔庆东、曹文轩等教授的视频祝福。

爱心社社长暨 2014 年爱心万里行总负责人王杰坤介绍了今年万里行的具体情况以及志愿者面试注意事项。今年的万里行项目组成立于 2013 年秋，在经历了半年多的尽心准备后将兵分五路，分别赴内蒙赤峰、内蒙巴彦淖尔、江西南昌、湖南石门、陕西华阴五地。尔后，王杰坤从邓颖手中接过了“爱心万里行”活动总旗，并分别向项目组五路负责人授予路旗。

在播放奥运冠军陈一冰对爱心社寄语的视频中，他表示，穿上这身衣服非常开心，同时也觉得责任非常重大。陈一冰说，做公益最难的不是一次性的付

出，而是无私的付出和坚持。他结合自己退役后正在从事“百所高校公益论坛”的经历，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公众传递体育精神和与高校学子共勉。他希望北大爱心社能够将爱心传递下去，并祝福 2014 “爱心万里行”圆满成功！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北京大学喜获“京华杯”北大、清华棋类桥牌友谊赛八连冠

5 月 11 日，第 28 届“京华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棋类、桥牌友谊赛在北京大学勺园举行。北京大学以 12: 10 的比分胜出，摘得“京华杯”历史上第一个八连冠。

“京华杯”组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张彦，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刘思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北京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务长高松出



席闭幕式。

张彦和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在赛前动员时对本次赛事提出要求和期望，并对参赛队员给予了关心与鼓励。今年北京大学作为东道主，校领导希望北大在比赛活动组织及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展现出自己的工作水平与实力，同时，他们也激励全体参赛队员继承棋牌队优良传统，敢拼善拼，力争斩获好成绩。

棋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仅富有游戏性、趣味性，也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和哲理。棋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濡养华夏民族气质的重要土壤。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棋牌运动智慧、雅致、沉静而灵动，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旨趣与行为方式，也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届“京华杯”以突出传统文化意涵、弘扬棋牌文化为特色，在环节设计中融入卷轴、水墨、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营造出古色古香、悠然雅致的氛围。比赛开幕式更是别开生面，以节目《古风棋韵》

切入主题，将对弈、古筝、茶道、舞蹈等情境表演融入其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了到场观众的由衷赞赏。



张彦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棋牌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人文魅力、高雅的艺术品质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大学近年来始终重视棋牌运动项目的发展，大力推动棋牌运动队伍的建设，积极开设棋牌类的教学课程。“京华杯”棋类桥牌友谊赛是两校间的传统赛事，两校应当珍视传统、淡化输赢，将眼光提高到文化交流和传承层面。他指出，棋牌运动在高校校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土壤。在大学开展棋牌运动，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培养和发展。

本届“京华杯”棋类桥牌友谊赛分上、下午两场进行，双方共有 22 支队伍参赛，其中包括中国象棋、围棋、桥牌共三个项目的教工队、研究生队、本科

生队以及国际象棋队、女子混合队。来自各院系、机关、后勤系统的 49 名师生组成的北京大学代表队严格遵守比赛规定，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发扬敢于拼搏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运动员们抱着“友谊第一、重在参与”的平和心态，胜不骄、败不馁，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采，充分展现了北大师生良好的精神风貌。此外，北京大学学生棋牌队全体队员身着自主设计的文化衫出赛，也成为了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北京大学以 12:10 的比分胜出，摘得“京华杯”历史上第一个八连冠。至本届比赛结束，北大以 19:9 的历史总比分继续领先清华大学。

作为北大、清华两校间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赛事，“京华杯”棋类桥牌友谊赛由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张学书和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张绪谭于 1987 年共同发起，由两校轮流主办。首届比赛在北京大学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 28 届。赛事自创办以来，一直受到两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经过多年的锤炼，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赛制、赛程、裁判规则和组织规则。“京华杯”的成功举办，为两校开展棋牌活动、传播棋牌文化、丰富师生业余生活搭建了平台，有力地促进了两校间的友谊与文化交流。此外，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两所高等学府间的竞技交流活动，“京华杯”日益成为全国棋牌领域的一大盛事，引起社会的大量关注和青年棋牌爱好者的浓厚兴趣。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平民学校“知校爱校，圆梦中华”主题活动走进北大红楼

在五四运动 95 周年之际，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重要讲话精神，深

化“知校爱校”教育，5 月 10 日上午，北京大学平民学校组织 50 余名学员前

往北大红楼参观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校长助理、工会主席、平民学校常务副校长孙丽，后勤党委书记、分工会主席、平民学校副校长刘宝栓，校工会副主席、平民学校副校长迟春霞出席活动。

孙丽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同北大师生代表座谈时，回顾了北大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光荣历史，充分肯定了北大师生长期以来为国家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对北大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提出了殷切期待。北大红楼为北京大学校舍旧址，孕育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希望学员们通过参观学习，感悟五四精神的丰厚内涵与现实意义，在“热爱北大、建设北大”的实践中，传承北大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学员们参观了蔡元培、陈独秀专题展和“新时代的先声”新文化运动主题展览，以及图书馆主任室、第二阅览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新潮杂志社和学生大教室等旧址复原。在校役夜班、平民夜校、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照片与资料前，学员们久久驻足。如此直观地了解北大平民学校的历史，追忆先辈们推动平民教育的伟大功绩，学员们感慨良多，表示此次参观是一次感受北大传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之旅，也是平民学校学员的一次“寻根”之行。

来源：新华网

编辑：拉丁

守望经典 阅读精品：第十一期博雅出版论坛北大开讲

5月17日下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代出版研究所、百道网、《出版人》杂志社、《出版广角》杂志社主办的第十一期

博雅出版论坛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楼347会议室开讲。本期论坛以“守望经典，阅读精品”为主题，由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东发教授主持。学院院



长陆绍阳参加论坛并致辞，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首任院长郝振省，剑桥大学语言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陈国华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王波等多位出版领域的专家出席论坛并发言。

陆绍阳在致辞中向与会学者和专家介绍介绍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近几年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并对博雅出版论坛的举办提出了期许和建议。他表示，阅读经典不仅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更是一个人自我完善的最佳途径，希望以此此次论坛为契机，引发学院师生对阅读经典的思考。

聂震宁就全民阅读和大学生经典阅读的话题分享了经验和看法。他对大学生阅读习惯和阅读方法向现场学生们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揭示了阅读经典的重要意义。经典书籍的作用在于其典范意义和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阅读经典是大学教育不可弃之道，学生们需要常读经典、读透经典，使经典之中蕴含的力量成为自身为人处世的精神依托和学术研究的工具。

郝振省以一位资深出版人的身份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了阅读的重要性。他重

点指出，读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文化附加值，坚持阅读则可以在经典中获益匪浅。文学的感性、科学的理性、伦理的德性、艺术的灵性……阅读各类经典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综合能力，是成长和教育最为重要的环节。

拥有多年经典作品翻译经验的陈国华教授与在场学生分享了他在研究、翻译与教学过程中对于经典书籍的感悟。他认为，创造经典的学者可以被称为大师，而一个好老师有责任指引学生接触大师、学习经典。此外，他还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学生们共同探讨了“大师与大学”的话题，并对孔子“有教无类”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全新见解。

作为《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副主编，信息管理系博士王波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颇有心得。他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的阅读推广工作，并结合北京大学特色，讲解了北大图书馆举办的一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如近期大受学生好评的“模仿西洋名画读书图”活动。结合阅读推广活动的实际举办经验，王波认为改革投资模式、国家图书馆设立常设机构、制定评估体系等方法都将有助于促进阅读推广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

作为5·28日建院系列活动之一，本期博雅出版论坛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楼建成以来举办的首次学术活动，受到了学院师生的广泛响应，论坛中对大学生经典阅读的研讨使在场学生受益匪浅。大学生深度阅读、经典阅读是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一环。大学

生肩负着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更需要阅读经典，开阔文化视野，从精神层面促进民族的发展壮大与文化的传承发扬。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伏牛堂的创业之路——北大平民学校举办第九期结业讲座

5月27日晚，北大平民学校第九期学员在理教307教室迎来最后一堂主课，“伏牛堂”创始人、北大法学院2014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张天一与学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讲座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主持。北大校长助理、校工会主席、平民学校常务副校长孙丽，校工会副主席、平民学校副校长迟春霞与学员一同聆听了讲座。



“伏牛堂”是一家经营湖南牛肉米粉的小店。创始人张天一在毕业找工作期间，从吴志攀教授的课上得到启发，也出于对家乡美味的向往，萌发了在北京开一家正宗牛肉米粉店的想法。在实施过程中，张天一学技术，找铺面，不断遇到压力和问题，但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张天一还和学员们分享了自己的经营之道，在互联网时代，注重体验式的服务，着眼于小生意上的附加值，并随时通过客人数据分析来尝试调整经营策略，这对学员们今后的创业、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张天一感谢北大对自己的培养，他说，北大人能担大任，也能做小事，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好。他认为这一段经历将令自己终身受益，特别是让他学会尊重任何劳动者，设身

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人，让餐饮业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

讲座气氛活跃，互动热烈，学员们纷纷表示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第六届“地球·公民·传媒”论坛举办

6月6日，在第43个“世界环保日”到来之际，第六届“地球·公民·传媒”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启用的“文化硅谷”报告厅举行。此次论坛以“环保公开课”的互动与传播方式进行，“公开课”主讲嘉宾分别来自“记者、行者、学者”等不同的职业群体，他们分别是北大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工作室创始人奚志农和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此外，来自北大艺术学院、城市与环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三名青年学生代表也分享了他们的环保故事。除了北大师生，来自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在京其它高校以及部分外地高校的学生及多家媒体聆听了这堂别开生面的“环保公开课”。

“地球·公民·传媒”文化论坛是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年度品牌活动之

一，从2009年起至今年已连续举办六届。论坛持续关注环保视域下的公民与传媒，无论是关注核危机、水危机还是聚焦媒体，提升青年学子的环保理念与环保行动始终是论坛一以贯之的努力方向。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刘伟教授在致辞中肯定了论坛多年来锲而不舍为环保传播作出的贡献。他说，北大电视研究中心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发展中始终为推动中国先进文化和主流价值坚持独立思考，勇于担当，不懈努力。



论坛发起人北大电视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俞虹教授以“环保公开课”班主任的身份，用



“责任与教育、当下与未来、理念与践行”三对关键词，阐述了论坛发起的宗旨以及坚守六年价值追求。她认为，环保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论坛始终以公民为核心词，立足传媒，既聚焦当下问题更前瞻思考未来。媒体影响力巨大，在环保公益传播中责任重大，以传媒为依托建设生态文明，更要有“拯救地球倒计时”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连续六届的活动，已有2000人次走进这个论坛。播种环保种子，倡导积极行动，不仅教育他人更在警醒自己，追求更健康、更绿色的生活方式是论坛组织团队的共同追求。

主讲嘉宾奚志农曾获得多项野生动物摄影国际大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摄影师。他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与动物摄影结缘、致力于动物保护的人生故事。在他看来，从事野生动物摄影，不仅要具备适应艰苦自然环境的能力，更要有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尊重以及对野生动物的平等关爱之心。他通过自己长年跟踪拍摄滇金丝猴的经历，告诫公众“人类多么自以为是，自誉为万物之灵，其实我们的本能在退化”，人类因为对自然的认识 and 了解非常有限，常常在媒体传播中出现常识性错误。奚志农还现场展示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图

片和视频，令观众在感叹之时也反省人类究竟该如何与动物友好相处。

敬一丹连续六届出席“地球·公民·传媒”论坛，此次她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审视反思了媒体在环保传播中的责任。她讲述了自己担当“自然之友”志愿者的缘由，进而质疑媒体在重大环保事件发生时偶尔“集体失语”的现象，并就环保事件报道中“事前、事中、事后”的应对措施提出反思与建议。她说：“每个环保日对于记者来说都是检讨日、自省日，今年的主题是向污染宣战，我们媒体工作者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是真正的宣战姿态。”

师曾志教授以“从‘地球村’到‘巴别塔’——自我赋权下的公益传播”为题，围绕新媒体语境下如何实现更加有效的环保公益传播进行了精彩的讲演。她认为，过去的传媒更多的是启蒙，今天则更多的是事实的介入。公益传播强调的是权力和资源关系的建构，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往往是自上而下，由地位、法律或者资源带来的，而今天的权力则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当中。新媒体给每个公民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当他们的意见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就可能达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恰恰是一种新的权力的摇篮。公益传播中的难

点在于形成一种领导力，即达成自己目标的能力。因此，讲故事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彰显人文情怀、环保意识，而是为了在不确定、甚至是失序的状况下传播自己的理念，并藉由他人帮助达成自己的目标，最终让公益传播期待的改变发生。



在嘉宾演讲之后，三位青年代表分别讲述了他们的环保故事。在北大学了 11 年的艺术学院的马骏博士连续参与了六届环保论坛的具体工作，他说：

“环保并非只是关乎国家关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它更是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要改变环境首先还是应该从改变自己开始。”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毛祺同学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谈了城市与环境涉及的核心问题“人地关

系”，即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处理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自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宋明真同学，也是北大“林歌”环保社团的负责人，她从高校环保社团的视角分享了“林歌”开展的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如“减少碳排量”、“垃圾分类”、“废品回收”、“盆栽绿植义卖”等。宋明真认为，“林歌”通过创意与创新，改变了以往一些环保公益活动参与者被动接受的模式，让高校社团的环保成为主动参与、快乐体验的行动。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听众争相提问，嘉宾们精彩作答，两个小时的“公开课”在热烈、活跃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当环保遭遇青年，当表达恰逢变革，“环保公开课”以理性思考、感性表达的方式聚焦环境问题，让在场听众感受到诚意、快乐与启发，有效推动了环保观念的再传播和环保行为的落实。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北京大学”讲座

5月16日,北京大学图书馆2014“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又添新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北京大学——中华龙与北大精神”的讲座在北配殿学术报告厅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段宝林主讲,图书馆副馆长肖珑主持。

首先,肖珑介绍了段宝林跟北大图书馆多年来的亲密关系,她提到,段宝林在2007年将个人收藏的有关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等一万五千余册图书捐赠给图书馆,图书馆高度重视这批珍贵的图书,专门设置了段宝林赠书室,供相关爱好者和研究者查阅使用。

段宝林的讲座以提问开始,一问一答中,段宝林为大家理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阐明了保护“非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段宝林指出,“非遗”主要是民间文化,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产,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源头,也是文人文化的祖先和奶娘,“非遗”的传承方式如今面临着断裂的危机,再不加紧抢救和保护很多就会消失。

段宝林谈到,北京大学跟“非遗”保护有很深厚的渊源,不仅是“非遗”

保护的首倡者,也是多年来“非遗”保护的积极践行者。早在1918年,蔡元培发表《校长启事》,组织“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使北大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发源地。北大也是上世纪60年代唯一坚持开设民间文学课程的院校,同时,由北大构建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成为现在业内全国通用的体系。不仅如此,北大编印的《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赞赏。

关于中华龙与民族精神、北大精神的关系,段宝林提出,古人把龙作为图腾就深刻体现了民族的“和合精神”,而中华龙寓意的腾飞、战无不胜的自信心正是北大人精神的体现,北大人长久以来排除万难坚持“非遗”保护,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跟中华龙的精神内涵是吻合的。

段宝林侃侃而谈,深入浅出的讲解体现了其深厚扎实的学术修养,饱含深情的呼吁体现出段宝林对民间文化的执着热爱和对“非遗”时下处境的深刻忧虑。与会者积极思考,纷纷提问,就中韩“非遗”申请之争、“非遗”保护的



国际差异、民俗的本质等问题跟段宝林教授进行了交流探讨。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一行到北大六院调研

2014年5月17日下午15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一行10人到北大六院开展调研。中国残联副主席、北大六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黄悦勤教授陪同北大六院院长陆林，副院长董问天、姚贵忠、郭延庆，党委副书记刘靖等接待了调研组。

座谈会上，张海迪分享了自己早年同疾病抗争、自学医学知识为村民看病的经历，特别是提到她帮助农村癔症患者的经历。她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精神无不鼓舞着在场的每一个人。陆林向张海迪简要介绍了医院的情况及在精神康复方面开展的工作。张海迪强调精神残疾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同样重要。

随后，张海迪一行到门诊五层正谊厅参加了由北大六院精神疾病康复中心

组织的“康复之友家属联谊会”。张海迪向各位精神疾患特别是精神残疾的家属表达了亲切的慰问和关心，热情地回答了家属的提问，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大家坚信未来的美好。

最后，张海迪一行参观了北大六院特诊病房、儿童病房和老年病房，深入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诊疗、住院及康复情况。本次调研充分体现了中国残联对精神卫生事业的重视，北大六院将继续开展工作，为精神疾患的治疗和康复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文/北大六院通讯员 何小璐、张霞)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北京全球健康论坛”在北大召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 Network - SDSN)“北京全球健康论坛”于2014年5月13日在北京大学召开。

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联合主办，讨论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健康的相关主题。来自中外多国的专家学者、国际驻华机构代表、中国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医疗卫生行业代表及部分北大师生参加了论坛。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SDSN）是联合国秘书长发起的一项特别倡议行动，并委托其特别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 Jeffrey Sachs 教授指导推进。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于 2012 年 9 月成立，旨在汇集全球的科学技术知识应对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各项挑战，特别是 2015 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 问题。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就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咨询，并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成立了 12 个主题组，其中包括“人类健康”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健康主题组联

席主席刘国恩博士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致开幕词，并就国家医改的三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全民医保制度建设的问题；公立医院改革如何探索发挥社会、市场力量的作用问题；国家医改如何更好定位医务人员，通过多点自由执业等制度安排更好调动医生积极性的问题。

论坛主题研讨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主席陈竺院士首先作了主旨发言。他围绕“中国卫生改革发展与健康国家战略”的主题阐述了中国医改的方向和发展蓝图，为国内外专家全面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议程提供了重要参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亚太主任 Joan Kaufman 博士主持了本场讨论。

接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执行主任 Guido Schmidt-Traub 博士作了第二个主题发言，他详细介绍了联合国行动网络的全面议程以及全球健康的行动目标与推进计划。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领导委员会联席主席薛澜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

之后，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行动网络主任、全球著名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 作了第三个主旨发言。Sachs 教授全面论述了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各国应采取合作行动的重大意义，并从人类环境治理、社会经济发展及全球政治共识等方面深刻讨论了促进全民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相关建议。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 Bernhard Schwartlander 博士主持了本场讨论。

针对三位主旨发言的相关议题，与会国内外专家就全球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健康促进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挑战、与政策建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了各种意见看法。最后，刘国恩作了总结发言。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网教之声

浅谈现代远程教育的评价与期待

远程教育的发展在中国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函授教育，第二代是广播电视教育，我国的中央电视大学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第三代现代远程教育。近年来，我国网络教育发展迅猛，它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为广大已步入社会的群众提供了学历提升的机会，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不少问题，比如地区发展不均衡，教学模式单一，教学交互性差等等，这些不足影响到了我国远程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因此，对现代远程教育进行评价日趋显得重要。

一、教育评价的概念

评价通常指对一件事或人物进行判断、分析后的结论。管理学中把评价定义为通过额定的计算来确定最优方案。在企业生产中评价是指采用检验来确定等级并且提高质量的方法。各个领域，各个专家都对评价下过定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评价：评价是指根据决策者的需要，由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进行调查分析以获得有关客体价值的描述判断客体的优劣或某方面的特征，以及达到某

种目标或标准的程度，为决策者做出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1〕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教育评价：教育评价是根据教育决策者的需要，通过对整个教育活动的调查分析，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为提高教育质量，帮助决策者做出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

二、现代远程教育评价的意义与作用

在远程教育中开展教育评价是非常有必要，也是极其重要的。教育决策者为教育提供了人力和财力，他们想了解教育活动是否顺利进行，如果结果与期待的结果不同的话，就需要调整计划以便日后更好地达成预期目标。具体而言，它有如下作用。

（一）诊断

通过评价可以发现远程教育中存在的不足。目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①东部发达地区在远程教育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上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②教学模式单一，无法将传统教学的优点转移到网络上，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够，进而影响到教学质量；③通过网络进行教学，

不要求老师和学生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步，客观上造成教学交互性差，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提出并获得解答。

（二）导引

通过科学的教育评价，可以为参加学习的学员指出一条获得良好学习效果的正确道路。学员通过获得的评价可以了解正确的学习方法，使学习始终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学习知识的过程，所走的道路将变得清晰明白。

（三）反馈

评价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反馈的过程，它分别为教师和学生指明了教学和学习的目标。远程教育拥有和传统教育相似的功能，学生通过反馈改进学习方式，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教师通过反馈提高教学水平，不断总结正确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

（四）激励

远程教育的特殊性造成教学者和学习者时空的不同步，教学者不能对学习者的进行适当的监督和控制。通过远程教育的科学评价，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刺激学员努力学习，使他们拥有获得知识的成就感，进而主动积极学习，远程教育的教学质量最终也获得提高。

三、现代远程教育评价的要求

传统的教育评价有诸多弊端，比如：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够科学，评价的价值标准单一化、片面化，评价的目的狭隘，为了评价而评价。现代远程教育的评价其最终目的应能促进和激励学生更多、更好地投入学习，帮助教师不断地反思和改进其教学，促进教师在专业上不断地得到成长与进步。好的教育评价应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评价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远程教育评价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一）教育评价要求全面性

教育评价的对象不外乎学生和教师，无论是对学生的发展进行评价，还是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评价，都涉及“评什么”的问题。对良好的教育评价而言，确定“评什么”是首要的，它涉及有关教育目的、目标等方面的价值定位；至于“如何评”，只是一个技术或方法问题，同确定教育的目的、目标相比，它的重要性是第二位的。以学生发展评价为例，回答“评什么”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回答教育的目标指向或定位问题。对学生的发展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评价，不能只针对认识领域的目标进行评价，还必须关注学生社会情感方面的发展。即便是只针对认识领域的目标进行评价，也不能只针对低

层次的认知目标进行评价，忽视对高层次思维技能或深层理解进行评价。总而言之，好的教育评价要求评价者首先要对教育的根本目的或目标有正确、深入的了解，以防漏掉那些主要的、基本的、重要的评价对象。

（二）教育评价要求实用准确

教育评价的结果要求实用准确。评价的结果要能够指导现实，切实有用，是相关利益者能够使用的。收集的信息应该是广泛范围内选择的，是与评价项目中的问题相关的，并能回应相关利益者的需要和兴趣。评价的定量数据应采用适当的系统分析，结果应当是可论证的。评价结果应该公正客观，以事实为依据，防止评价者把自己的个人偏见带入评价过程，减少评价者个人主观因素或外界因素对评价的干扰与影响。

（三）教育评价要求合理可行

评价采用的方法、手段要能够检测出评价者所要检测的东西，即评价的方法与手段必须与评价的对象或内容相适应。当评价的对象或内容发生改变时，需要及时调整评价的方法与手段。评价标准与评价的任务和目的具有内在的、理性的关联，各个评价标准之间要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各个评价指标权重大小的分配要合理。教育评价的实行过

程是现实的、审慎的、灵活变通的、花费少的。

四、建立多元发展的评价机制

宏观层面上的远程教育评价是对国家有关网络教育政策，学校的办学水平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评价。微观层面上的远程教育评价主要是针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以及对组成远程教育的各种要素进行评价。开展远程教育的评价，必须建立多元发展的评价机制。

传统的应试教育评价，对于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考试成绩是判断其学习好坏的主要依据。现代远程教育应发展多元评价，其内容不仅要包括学生的智力，还应包括其认知能力、学习策略、学习表现、学习态度与情感等多种信息。多元发展评价的依据，除了量化的考试成绩外，还应包括学员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档案材料，比如平时的作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学员的真实水平和未来的发展潜力。

多元发展的评价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次性评价得出的结论。评价将贯穿整个教学活动中，它关注的是评价对象的发展与成长过程，提供学员更多的评价机会，也给予学员更多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多元发展的评价可以

为评价的参与者和评价结果的使用者提供关于评价个体发展的纵向信息。

评价的实施按评价主体来分可以有三种情况。第一，学生自评。远程教育的评价主要依赖于学生的自主实施，学生主动参与并进行信息的收集，自己分析出学习情况，对学习过程进行反思，进而规划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第二，教师评价。通过教师评价对学员的成绩、作业、反思等作出适时指导，以外部反馈的形式提供给学员，进一步强化学员的自我评价和反思。第三，学员互评。学员之间水平相当，经常面对相同的问题，作出的评价比较有针对性，改进的意见也具有更多的建设性和可行性。

多元发展的评价必然尽可能运用多种评价方法。如：定量评价结合定性评价、分析评价结合综合评价、阶段性评价结合总结性评价。评价手段也因此多样化，可采用问卷法、加权求和法、测验法、档案袋法、价值增值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来反映出学员在知识技能及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真实表现。

多元发展的评价对关于学习目标的设定应该是多样性的，允许学员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要实现的学习目标主动“发展”^[2]。现代远程教育是一个个

别化的学习，即便学生处在同一环境、同一学习目标下，也可能因为知识背景、发展需求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学习行为方式，导致学习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很难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学员所取得的学习成果，获得了多少益处。现代远程教育的学习目的不是为了让每一个学员获得同一个学习结果，而是为了切实满足学员自身学习与发展的需求，使每一个个体的发展获得最大化。

五、现代远程教育的期待

远程教育的学习者要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绝非易事，仅仅靠把课程资源封装起来，然后通过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手段传输给学员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并不能保证远程教育的教学质量。大多数远程教育机构都会花大力气去开发、设计、建设课件资源教学包，试图把学员的各种学习需求都包含其中，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教学包不重要，教学资源包固然重要，但这些都是可包装可传递的产品，现代远程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学员与辅导教师之间，学员与教学机构之间，学员与学员之间都需要相互沟通，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学员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学习的效果，维持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这就是一种学习支持系统，它是一种服

务，这种服务是教学包无法涵盖和解决的。

对远程教育而言，这种学习支持可以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教学资源前期都已基本建设完毕，近期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放到服务上来。远程教育的学员自我调节能力一般都不理想，尤其是刚接触远程教育的新学员，往往对远程教育缺乏了解，在刚开始学习时会有一定的困难，很希望得到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上的指导和咨询，因此通过专门的服务系统对学员提供学习技能的指导和培训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国外很多大学的普遍做法。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普遍感到孤独缺乏交流沟通，因此可以加强学员组织建设，开展沟通讨论活动，形成网络社区，学习共同体，增强凝聚力，使学员在远程教育中找到归属感、认同感和团体感。图书馆在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知识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远程教育的学生也应该能够得到相应的便捷的图书馆服务，通过图书馆提供的检索、咨询、文献借阅等服务，学员可以方便地得到自己所需的资料进行论文写作等

学习活动。远程教育的学员非常希望在当地能够提供学习辅导，适当面授，组织活动，因此发挥当地教学点对学员的支持服务工作也非常重要，可以适当加强当地教学点的学习辅导支持功能，围绕教学组织开展活动。

现代远程教育正受到来自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的冲击，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下，如何及时调整定位，采取何种应对措施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只有通过教育评价才能真正了解问题并及时改进，立于竞争的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 [1] 杨子平，远程教育中学习评价《当代教育论坛》2010.8
- [2] 王朋娇，孙来福，基于 Blog 的 Portfolio 网络学习评价初探，《现代远距离教育》，2007.2

来源：2014 年北京现代远程教育学习中心会议征文

作者：苏州学习中心 赵杨

从理想到现实：在线教育重建教学管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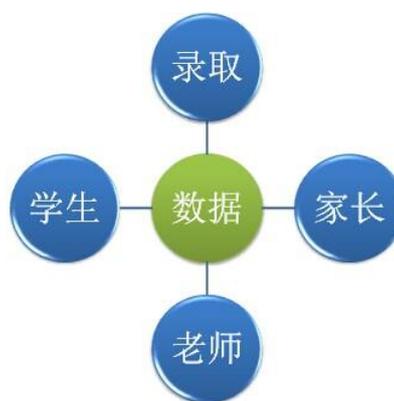
2011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创始人及总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在北大附中演讲中指出，中国与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最大差距体现在学生学习动力不足方面。这个也揭示出传统教育教学体系是在建立在学习动机的基础之上，由于学生缺乏自制力，就需要一个涉及课堂、教务、监控、评估的庞大教学体系来进行管理，其目的是激励学生的动机，落地点是教学制度。在激励学习动机的过程中默认学生的动机不够强烈，主角仍旧是老师。

而以技术为基础的线上教育，是以学生的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在线教育系统来“满足”这些需求，需求满足即结束，主动权由学生把握。因此，在线教育的成功实施，必然要对教学管理体系重建。

来自分享经济的启示

在我们讨论在线教育的管理体系的设计时，需要从分享经济那里寻找结合点。分享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拥有着数百年的历史。而我们现在关注的分享经济是在互联网背景下“新的分享经济”，其具有“管理”和“社会化”两大特征。管理是指对分享经济各个参

与者进行甄别，确保其真实性；社会化指在确认参与者真实性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共享，并通过“众包”来验证数据的合理性。同样，在线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依靠人工还是依靠技术，首先要甄别学习者的真实性，确保学习者是真实存在的“本人”，不是一个虚拟形象，也不是作弊者；其次可以分享学生、老师、家长和同学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所产生重要数据。



在线教育管理体系

在线教育的关键在于社会化，通过社会化实现学生、家长、老师的互联，使家长、老师都能了解学生的进度，并能将三者所产生的关键性数据分享给录取者（即高一级的学校或企业雇主），我们都知道通过一本书能了解一个人，同样通过一组学习数据也能了解一个学

生的水平，这就使录取者根据学习者日常的表现数据作为参照，以决定是否录取、录用。这也就解决了一考定终身的问题，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教学资源的有效分配，达到教育平等的目的。

信息不是知识，但运用信息的能力超越学习知识

本周就在我们关注高考时，一则《高三学生放弃高考搞发明希望被免试录取》的新闻引人注目，新闻的主角都已经通过自己的发明创办工作室并能有一定收益时，重庆大学仍旧认为不参加高考，分数不能达到一定的标准不能录取，而作为企业雇主的美菱冰箱也表示不经历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坚实的基础也谈不上创新。

对于现在录取者的这种表态，似乎也说明了传统教育的坚不可摧，但实际上这不过是旧思想的反抗。正如杜威所言：“不幸的是，人们，受过教育的人们，仍旧受制于隔绝而自足的理性和知识这一概念，以致拒绝领悟这一学说的意义。”现在的传统教育受“信息不是

知识”影响较大，认为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构不成系统的知识，只有通过系统学习才能具备坚实的知识基础，教育在向服务业的转变中，其最大的收益是知识运用，有效运用信息的能力的意义远远大于知识储备。

因此，在线教育的管理体系构建，是在大数据基础上，通过一定的算法将数据形成一系列可以相互链接的指标，以指标的差异性来区分学生学习水平。如果这名高三学生在不能被大学录取的情况下，可以通过MOOC、网易公开课等平台得到世界上最知名教授的指导，用4年的学费作为创业启动资金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在线教育的管理体系中，最大的漏洞是作弊，即如何保证是本人在学习，而不是枪手代劳。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您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来源：多知网

作者：毕汝杰

■ 北大人物

宿白：此中无限兴 考古可醉人（下）

筚路蓝缕 开启西藏考古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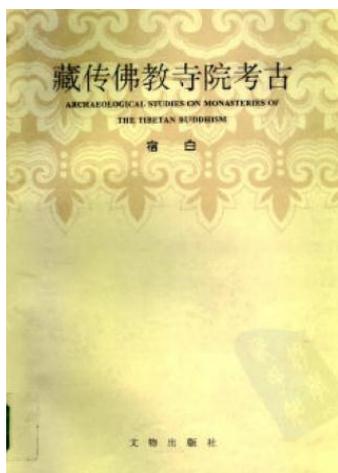
在宿白先生的佛教考古研究中，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格外引人注目。雄踞高原的西藏地区，无论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面貌，在中国的土地上都独树一帜、别具风情，神秘而迷人，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近代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从欧洲人开始的，意大利人朱塞佩·杜奇（Giusepp Tucci）自1929至1948年曾八次入藏调查寻访，搜罗了大量文物，也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作。尽管这些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专业性、系统性和深度上都有相当的欠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关注，促使人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藏。对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

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专门的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入藏开展工作，宿白先生即是其中的主要成员。6月-11

月间，文物调查组乘汽车从藏北进藏，途经藏北、拉萨、山南、日喀则等西藏大部分地区，行程数万里，时间近半年。宿白先生回忆，“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当时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白先生拿的是一台“莱卡”机。调查期间大家拍了大量照片。除了照相，每个人都做了大量笔记。宿白先生还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调查全过程。当时，几乎每调查一座寺院，先生都会绘制平面图和立面草图，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关于这些草图，在考古界还有一段传闻：宿白先生当年在西藏调查了大量的寺庙和建筑，条件有限，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虽是步量目测，却“八九不离十”。据说后来有人用尺测量，发现确实相当精确。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时隔近三十年，宿白先生受西藏文管会的邀请，第二次入藏，十余天的短

期考察使他痛心地发现，当年考察过的很多寺院已在十年浩劫中被毁。先生决心将两次入藏搜集的资料重新进行整理，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考古学的研究。此时的宿白先生已年近七旬，为了更好地掌握和参考藏地文史资料，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了这门新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参考了大量汉文、藏文和外文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宿白先生赠书时发现，先生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的一类，大约有 260 余册，几乎涵盖了 2000 年之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都是为撰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所辑聚的。先生自陈：“写（《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肃、性格的谦逊，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惊人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工作在当时几乎是一片空白。宿白先生认识到，自西元 7 世纪中叶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也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涉及到西藏历史的诸多方面。先生的研究，也就格外注意通过对于藏传佛寺的研究，传递更深的历史讯息。例如先生在对拉萨大招寺第二阶段建筑遗存进行剖析时，发现了 11 世纪中国内地斗拱的典型样式，从而推断当时的雪域高原就可能已经有内地工匠活动，这些内容在目前发现的任何文字资料中都没有记载。

经过先生近八年的不懈努力，1996 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完成付梓。这部著作近 30 万字，400 页，配有数百幅照片和线图。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 54 处寺院、89 座建筑进行了分期研究，并按时间顺序画了一张十分详细的藏传佛教寺院分期图，创造性地提出了西藏寺院五期六段的分期方法，并阐明了各时期演变的社会意义。书中的大量草图和照片成为重建修复西藏著名佛迹的珍贵资料。此外，书中还记录了

甘肃、青海、内蒙古明末以前和元大都、杭州两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的少量资料，对于全面了解当时藏传佛教的分布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著作被誉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西藏芒康的古盐井

宿白先生不仅在学术上，为西藏考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还一直关注西藏的文物保护事业。2009年，已87岁高龄的宿白先生得知云南德钦故水电站即将修建，工程可能导致西藏芒康盐井盐田被淹没，一向关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西藏有特殊感情的宿白先生立即命笔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份情辞恳切的信，不仅表达了保护芒康盐井盐田的心愿，还提出了宝贵的可行性建议。这封信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局长单霁翔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来到芒康进行实地调研，听取当地藏族民众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最终

使这处文物纳入国家保护计划，避免了水电站工程的威胁。芒康，这座茶马古道第一古镇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讲台上的一甲子：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

在宿白先生九秩华诞之际，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张忠培这样总结先生为中国考古教育做出的贡献：“宿白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位主要创办人，同时，他也是被誉为‘考古学的黄埔军校’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教学和主要教学管理人员。我国自50年代起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学工作的绝大多数考古专业人员，无不是宿白先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学生，宿白先生的桃李不但遍布中国大陆，还分布于境外的一些地区与国家。宿白先生是中国大学考古学科教育的开山鼻祖，是中国考古学的杰出的教育家。”

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教学岗位奉献的一甲子，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园，一天星斗。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临安城和扬州

唐宋城的考古勘察发掘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大声疾呼的考古学家徐莘芳，是宿白先生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领域深有造诣，继宿白先生后成为这一领域优秀代表的马世长，是在宿白先生指引下，走近石窟，走上了佛教考古的道路。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也正是参加宿白先生的带领的田野实习中，第一次来到莫高窟。



宿白先生（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6级同学在云冈实习

曾有人这样概括中国考古学教育的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大学教育与中国的考古学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追根溯源，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另一是北京大学破天荒地开办了考古专业。”勇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大学，1922年即在国学门（后改名文科研究所）成

立了以马衡先生为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室，外聘罗振玉、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信导师。1983年7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任命宿白先生为第一任系主任，成为北大考古学系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先生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后，宿白先生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1948年即开始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教研室任教，虽然于1992年退休，却并未因此而远离讲坛，耄耋之年还在为北大考古系的研究生开设课程，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田野实习。2001年，年近八旬的宿白先生为考古系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汉唐宋元考古课程，主要讲述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回忆：“宿先生讲课极为认真，事前都写好详细的讲稿，课上涉及到的引用文献，即便是较

大段落，也亲自板书，供大家抄录。讲起课来也很和蔼。”宿白先生备课的认真，没有亲临课堂的人也能感受到。近年来，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宿白先生未刊讲稿，收入了大量的教案、手稿和各类手绘图，先生对待教学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令人折服。

宿白先生重视将文献与实物相结合的学风也对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任教的秦大树曾师从宿白先生，在教学中就深受宿白先生这一理念的影响：“宿白先生非常重视和善于在考古研究中运用古代文献。他在教授研究生的课程时，便要求学生‘听历史系的文献课和断代史课’，一是要‘了解历史’，二是要‘学会怎么收集和利用文献’。”优良的学风，就这样一代代得到传承和发扬。



宿白先生（右二）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1953 级同学在洛阳实习

宿白先生对待学生治学要求严格，批评从来直言不讳，曾经在给高年级学生开具必读书目时，切中肯綮地指出“大学教育学科越分越细，学生文化素质明显下降”，在读书的深度与广度及研究方法上提出严格的要求；先生对学生的成长又非常宽容，多有鼓励之语，常勉励从事考古的学子风物长宜放眼量，“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首要的是学好本领。学习的方面要宽阔一些，因为你将来从事的考古工作复杂多样。其次是做好迎接较辛苦但很有意义的田野的工作的思想准备。不要为暂时出现的出路问题而自找烦恼”。就在最近，宿白先生还寄语青年学生：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念书，工作以后有的是时间做。要珍惜做学生的时光和机会。

2010 年，先生将自己毕生的藏书捐献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以考古、文史为主，不乏稀有的线装书、拓片，截至 2010 年底，已捐赠捐赠书刊 11641 册、拓本 135 份。这篇赠书都是先生读过、使用过、批点过并一直在用的，和宿先生的学术人生密切相联，是



这位考古大家一生学术工作的积累，伴随和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发展、涵盖考古学的多个领域且比较系统完整，十分珍贵。2011年，经过各方的筹备和努力，宿白赠书室在北京大学图书馆311室正式向读者开放，几千册珍贵的书籍在架供师生借阅。这是宿白先生留给北大的又一笔财富。

宿白先生闲暇时喜欢治印，曾有一方印云：“以寿补蹉跎”，先生的一生挚爱考古，潜心学术，著作等身，可谓从无荒废蹉跎，但先生却总是觉得时不我待，在鲐背之年，仍愿继续投身考古学的发展，兴味不减。他至今仍坚持科研、读书不辍，并始终亲力亲为。这

是考古学的感召，是教书育人的魅力，也是先生一生为学、为师精神的折射。

先生成就卓著，仰之弥高，常有媒体希望能采访先生，先生总是婉拒，说“我只是一个教员，一个北大的教员。”说到过往的酸甜苦辣也只是一个词——“不苦”。当大家祝贺先生获得“蔡元培奖”时，先生非常谦逊地说：“我没有做过什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将一直泽被后学，也汇入北大学风与师风的长流。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素馨

王瑶：最有精神魅力的人文学者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 65 岁，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

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 76 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

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 3 篇文章有两篇还可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

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顾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至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

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 30 年代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 30 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

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思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

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

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

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75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

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王瑶（1914—1989），字昭深，山西平遥人。文学史家。1934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43年至1946年为昆明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研究生，师从朱自清。先后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14年5月7日

作者：温儒敏

■ 北大学者谈读书

俞平伯：读书的意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仅有关联，是一桩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当有种种的原因，最浅显得看法，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位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夜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迂阔，荒谬，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有一个故事，不见得靠得住，只可以算笑话。

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拿来开玩笑的，若回答说不知道，那未免杀风景。纪回答得很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人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退一步说，以名为利。然名利双收，话虽好听，利必不大。惟有不恤声名的干，以利为利，始专而且厚。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联。

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工。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

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地低落，别字广泛地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是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发展。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语》，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

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俱在，不容易否认的。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的人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了。

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文史学家、红学专家、诗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曾加入北京

大学新潮社，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一员。任北京大学教授多年，著有《红楼梦研究》、《读词偶得》等。

选自《北大学者谈读书》

傅斯年：论学校读经

记得十七八年以前，内因袁世凯暴压后之反动，外因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义渐在中国知识界中深入，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左倾，批评传统的文学，怀疑传统的伦理。这风气在当时先锋的重心固然是北京，而中山先生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实给此运动以绝大的政治动向。我们从他当时所表现的议论中清楚地看出，他是觉得专是一种文化的革命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国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国才能动转。中山先生提倡“把中国近代化”之功绩是后来中国人所万不当忘的。溯自建业建都以来，政治上要右转些，本为事理之自然，当为人情所谅解。不料中国人“如醉人，扶之东来西又倒”。一朝右转，乃至步步倾之不已，只弄到去年的祀孔！远史不必谈，姑谈今史。清升孔子为大祀而清亡，袁世凯祀孔而袁世凯毙。韩退之有句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大凡国家将

兴，只问苍生，国家不了，乃事鬼神，历史给我们无数的例。祀孔还不算完，接着又有读经的声浪，这事究竟演化到如何一步，我不敢知，我只替国家的前途担心。提倡革命的人们，无论左向右向的革命，总不免把主张说到极端，到极端才有强烈的气力，然而手操政权的人们，总应该用充分的知识，健强的理智，操持中道的，中道然后有安定！特别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今日中国，应该做的是实际的事，安民的事，弄玄虚是不能救国的。在批评读经政策之前，有几件历史事实应该知道。

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家每每衰落的。我们且一代一代地看去。周朝远没有受这些经典于前代，那时候的学问只是些礼乐射御书数的实际事件。秦朝焚书坑儒，更不必说。汉朝的缔造，一半赖高帝之武，一半赖文帝之文，高帝侮儒，文帝宗老，直到武



帝才表章六经，然而茂陵一年所行，无事不与儒术相反。宣帝以后，儒术才真正流行，东海边上的读经人作师作相，汉朝也就在这时节起头不振作，直到王莽，遍天遍地都是经学。李唐创业，最表彰的是老子，到了玄宗，儒学才在中天，玄宗亲自注孝经，玄宗也亲自听破潼关的渔阳鼙鼓。赵宋德太祖太宗都是武人，真宗像个道士，仁宗时儒术乃大行，也就从仁宗时起仰契丹如上国，有蕃夏而不能制。赵普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却不知道他受南唐瓜子金，教太宗以夺嫡，在半部之外或在内？明朝是开头提倡宋元新儒学的，其结果造成些意气用事的儒生，酿成燕变而不能制。若不是当时外国人不闹，若不是永乐真有本领，中国又要沉沦了。再看偏安的南朝。南朝的第一流皇帝，一个是纯粹流氓刘寄奴，一个是高超儒生萧老公。刘寄奴到底还灭燕灭秦光复旧物，萧老公却直弄到断送南渡以来的汉人基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蔑视六经、《论语》、《孟子》等之历史的价值。它们在当年自然有过极大的作用，我们的先民有这些贡献犹是我们今日可以自豪自负的。我只是说，虽在当年简单的社会里，国家创业也不是靠经学的，而一旦国家充分提倡经学，一面诚然陶冶出些好人物，

一面又造成些浮文诡化的儒生。不看宋明的亡国吗？儒生纷纷降索虏，留梦炎本是状元，洪承畴更是理学人望，吴澄钱谦益则胜国之盖世文宗也。事实如此，可知在古时经学制造的人物几经是好的敌不过不好的了。或者当时若没有经术，事情更糟，也未可定，不过当时的经术并无六七十分以上的成绩，是件确定的史实。

二、当时的经学，大部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故，策论家装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缺点虽极多，而真正用经文“正心诚意”的人可就少了。这本也难怪，经文难懂，又不切后生生活。所以六经以外，有比六经更有势力的书，更有作用的书。即如《贞观政要》，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远比《书经》有用；《太上感应篇》是一部乡绅的教科书，远比《礼记》有用；《近思录》是一部道学的教科书，远比《论语》好懂。以《春秋》教忠，远不如《正气歌》可以振人之气，以《大学》齐家，远不如《治家格言》实实在在。这是在历史上有超过五经作用的书。那些劝善报应书，虽雅俗不同，却多多少少有些实际效用。六经之内，却是十分之九以上但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我这些话不是我的

议论，更不是我的主张，只是我叙述历史的事实。若明白这些事实，便当了读经的效用，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即就维持儒家的道德教化论，在这年五经大半也还是门面的，也还是靠别的书支持儒教。那么，在当年的社会中失败了读经，在今日反能成功吗？

三、汉朝的经学是汉朝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柬书”，哪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之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介石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附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汉朝宋朝的经学在当时所以有力量者，正因本是思想创造的事业，本来不是纯粹的经学，所以才有动荡力。清儒之所谓汉学是纯粹的经学了，乾嘉的经学也就全无政治的道德作用了。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为今文为“康梁逆党”之学，不得用，读经乃全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用八股时，那时学堂讲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者，如做梦一般。我不知今之主张读经者，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是最费气力不讨好的；如欲以之充实道

德力量，还要先有个时代哲学在。不过据六经造这时代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

据以上三类历史事实看去，读经从来不会真正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会真正靠它过，只不过有些愚民的帝王用它笼络学究，使得韩文公发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公式，又有些外来的君主用它破除种族见解，弄到朱文公也在那里暗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称赞金章宗！

难道相去不远的旧社会试验两千年不曾完满成功的事，在相去如南北极的新社会中值得再去尝试吗？以上是历史的考察，再就现在的情形论，尤觉这一回事断不可办。

我的见解如下：

第一，现在中小学的儿童，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减的，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同时，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程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况且现在的世界是列强竞进的，若是我们的中小学程度比起欧美日本同等学校来不如，岂非国家永远落后，即是永远吃亏？在这又要儿童青年健康，又要他们程度不比人差的难

题下，原有的功课已嫌难以安排，若再加上一个千难万难的读经，又怎样办？挖补自儿童的身体呢？挖补自儿童的近代知识呢？第二，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厥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若是教师自己说实话“不懂”，或说“尚无人真正懂得”，诚不足以服受教育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强作解事，无论根据汉儒宋儒或杜撰，岂不是以学校为行诈之练习所，以读经为售欺之妙法门？凡常与欧美人接触者，或者如我一样，不免觉得，我们这大国民有个精神上的不了之局，就是不求甚解，浑沌混过，又有个可耻之事，就是信口乱说，空话连篇。西洋人并不比中国人聪明，只比我们认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过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以上第一件说明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件说明“教不成”

它。我想，这也很够反对这件事的“充足原理”了。至于六经中的社会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经中若干立意不适用于现在之国家，整个用它训练青年不定出什么怪样子，更是不消说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觉得人文精华萃于中国之先秦，真正陋极了！

至于感觉目下中小学国文及历史教材之浅陋荒谬，我却与若干时贤同意见，这是必须赶快想法的。政府或书店还应编些嘉言集、故事集、模范人格的传记以作教训，以为启发。国文、公民，及历史的教材中，也当充分以此等有用的材料。这些材料必以中国为限，其中国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资于六经中之易懂的，有启发性的，不违时代的材料。这就很够了。

附：傅斯年反对读经

1934年7月，执政当局规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提倡尊孔读经。当年8月27日，南京中央大礼堂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与此同时，叶楚傖、傅汝霖等人前往山东曲阜祭孔。随后，还推出了《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和《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前者决定在财政拨款和各地分摊的基础上，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

后者则对孔孟后裔予以各种优待。针对这一现象，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跽”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也说：“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相比之下，傅斯年则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1935年4月，傅斯年以《论学校读经》为题，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文章说，从历史上看，倡导读经的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成功。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第二，由于经文过于难懂，因此当年的经学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就是被当成敲门砖来使用；第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那些主张读经者不过是用经学来附会自己的主张罢了。就现实而言，要想在学校倡导读经也不可能。第一，

根据教育的本质、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状况，目前在“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由于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如果把它纳入教材，“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这对青少年的理智和人格是极大的伤害。该文发表后，胡适认为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一读，便在《独立评论》上予以转载，他还写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该文作了补充。胡适说，傅斯年的文章虽然“无一字不是事实”，但其中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话却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此，胡适在文章中首先引用王国维的一段话作了解释。王先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这就是说，对于六经中的《诗经》和《书经》，不仅王国维自己不能完全读懂，就连汉魏以来的经学大师也未必真懂。于是胡适问道：“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胡适说，经学必须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解决其难懂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在

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回顾胡适、傅斯年等人数十年以前反对读经的意见，再看看近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论，其问题的实质也就显而易见了。

1935年4月，傅斯年以《论学校读经》为题，

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

好文共赏

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我们推广了十多年的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课程虽涵盖了许多方面，但最缺乏的是对我们自己、对整个人类的理解关怀。用宽广的立场去看全人类，不是只看台湾，只看中国大陆，只看远东，而是放眼全世界。不仅仅是有形的世界，而是整个人类的存在与文化。很少有这样的课程，但却极其必要。通识教育，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全人。那么全人就应该了解自己，知道科学，也了解整个人类。所以重点在于跳出“此山中”的观点，由“凌空”的观点，来看看如何由“全人类”的立场看通识教育。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负有许多对国家社会的义务，但也比较少去谈到这些义务。之前有许多讲座谈到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批判等，但比较少用全人类的角度来谈到如何用更宽广的角度来了解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观点不应狭隘，不是只注意到自己本身，而是要从宽广的外界来看。不只要谈人类自己，而且要和人类的文化合在一起谈。

我们对人类经常有许多误解：种族偏见、宗教冲突、生态破坏、环境危机、新疾病产生等种种问题。都使我们觉得人类已陷入了困境。除开枝节性的解决方法外，也应该由更宽广的立场来了解人类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跨进 21 世纪，迎接 22 世纪。有长远观点的知识分子，才是现行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全人。而这样一种全人类的观点，主要是从“人类学”出发。

如何由人类学的立场来看问题，使通识教育更宽广，使知识分子的立场能更有世界性，有长远的观点？以下将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不做一般的泛论。以“山外”的立场，取代“此山中”的立场看人类文化的问题。第一个论题，要谈到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与文化共同发展的的问题。一般人常将人类的生物体和人类的文化当作两个范畴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人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文化的有无。因为有文化，所以人才成为人。



400 万年前，人刚跟他的共祖分开时，最主要是因为他有文化，才成为人。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理解他的整个机制，才能知道人与文化整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400 万年前，我们和猴子、猿类一起的共同祖先，大半是生长在树上，即所谓的树行动物——他不能够下地，只能用手抓着树枝爬行。而人类祖先第一个的特征，就是能够直立，能够下地走路。四百万年前，人类祖先是如何由树上到地下的呢？科学家并不理解。目前的一个推测是最初在东非那一带，人类祖先出现的时候，因为一个气候的大变迁，使得树木都死亡，人不得不下地走路。也许人刚下地的时候像猩猩一样。但为了适应没有树木的环境，慢慢要站直的能力。站直了以后，可能有很多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就是使人类的手解放出来，不必用于攀树，而开始能用于制造工具。工具的出现，就是文化出现的第一步。猴子的手虽能持物，但必须用于攀树，所以无法像人那样技巧地拿东西。工具的出现，是文化的滥觞。而后经过四百万年的进化，工具愈趋精密，头脑更为进化，交互刺激之下，

成就了今日的科技文明。人由此与动物分野，故而人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

而让人类下地的原因是偶然，既是偶然，则不可能重复再出现。因为偶然下地、直立、使用双手制造工具，形成文化，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而人类起源于东非，慢慢演化成世界各地的各种种族。所以人与文化是等义的，是不可分的。人源于共祖，而后各自发展，所以全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种族。所有种族都平等，无阶级上下、智商高低之别，这是人类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重大启示。人类的 IQ 测验是人类文化分歧后产生的测验方法，但人类的种族技能却是永远相等的。把一个纽约市民放到非洲丛林，不出三天就死了。把一个非洲部落人放到纽约去，他也无法生活。并非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适应环境的知识不一样。这差异是文化后期所产生，并不是导因于种族智能的差异。这种观念，才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知识。这样的基本知识，应该在通识教育的一开始就教给大家，以消弭大家种族、族群有差异的观念。这第一个例子在说明，具备对人类起源、人类知识的了解，以及全人类的广阔关怀，才是一个健全的大学生。



第二个论题，同样来自人类与文化的演化问题。吊诡的是第二个论题虽与第一个论题相关，却看似互相矛盾。不过仔细研究，就可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就第二个论题：人与文化的进化来说，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有文化，能制造工具。一般人都以为，人因为有了文化，能控制环境，与动物不同，所以能摆脱生物进化的限制，这是错的。虽然人类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明与科技，但他的生物体仍须服从自然的规律。从达尔文释天演论至今，无人能免。虽然已有部分的学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但一个人类学者却不能不认清这种普遍的谬误，此一正确的观点，将使人类能有所警惕，而且此一重大观点，对于社会的存在，将会产生重大的意义。从达尔文开始，大家开始了解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但同为适应，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太过完全的适应，如大家所了解的，是由生物无意识地繁衍留有适于环境的子嗣，而达到种族延续的功能。但太过适应环境，却因此而僵化了。一旦遇上环境改变，就可能因缺乏应变的弹性而惨遭灭绝的命运。“过分的适应”，在生物学上称为“特化”。太特化的生物种族，在生存上经常会造成不良的适应，

现在已经灭绝的北美洲大角鹿就是一例。

大角鹿的灭绝过程有如寓言一样，他们靠着又大又硬的大角，来战胜其他的动物，以及在同种族中取得优势。打赢的公鹿，较有机会将它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植入基因簿。于是下一代的小鹿就越来越趋向于拥有大角。经由一代代的传衍，角越大越取得优势，于是子孙的角越来越大，但是，最后却大到了超过所需的程度，形成特化。大角固然能打胜仗，但因为角太大，跑不快，在遇到其他跑得快的肉食动物时，就容易因为行动迟缓而被吃掉。于是，原本是环境适应佼佼者的的大角鹿，就因为“特化”，变成适应失败者而灭种了。经由大角鹿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警觉到，虽然适应环境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最特别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特化”转为不能适应。

反观人类，我们不必直接用生物体的本身作为进化的武器来和大自然对抗，我们有种种文化设施，种种的科学发明，以至于人类的身体不需要十分的发达，不需要有很长的手指，不需要有很宽的耳朵，也不需要有很敏锐的眼睛，因为我们已经有雷达、收音机。因为我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发展，来保护我们



的身体，使我们不需要直接用我们的生物体来适应外在的环境。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一种“体外器官”，这是非常特别的名词“interal organ”，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不需要发展人身上的一部分来对抗自然，“文化”可做为人身上的一部分；虽然说文化在外边，但是他还是生物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他是“体外器官”。这“体外器官”的发展，还是要服从“进化”的规律。

关键在此，文化固然能让我们适应环境，但是环境什么时候会变迁，我们却不知道，人类虽然较其他生物能知觉、预视到 21 世纪的到来，大部分的人却未察觉到我们的文化已经像大角鹿一样特化了。我们的文化已经几乎发展到死胡同里去了，种种自然环境的变迁，生态的不均衡，种种新的发明，已经反过来限制了人类的发展。别的不说，单指人类特别依赖石油这件事来说，就是一种特化的现象。台北市今天假设没有石油，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反之，住在嘉义、住在台南的人，他还可以找柴火来烧。这些燃料不是永远用不完的。也许一个世纪以后就用完了。这是人类文化特化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更不用讲人类其他种种的发明。比如药物的发明，

药物帮助人类去除很多疾病，但是药物又倒过来引起了很多新的疾病。使我们这个种族本身，又受到另外一种的限制。药物的发明，几乎也是一种特化的现象。又如原子的发明，核子燃料的发明，这都是一种特化。人类看得到 21 世纪，却看不到人类文化的进展也是一种特化的过程，这非常危险。人类如果继续特化下去，很可能没有 22 世纪的到来！

第三个论题，要从“人类与文化”的“生物面”，慢慢深入到“文化面”的层次。以一个复杂的例子来说明。人类社会种族与种族间的矛盾冲突，也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化”情形。这种种的矛盾冲突，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跳出自己的文化立场来看问题。例如今天的西方社会，对自己的成就非常骄傲。他们以为自己的科技超越了所有，代表了人类文化先进的一部分。这种错误的观点，就是因为不曾特别去理解关怀人类 400 万年文化的发展过程。西方文化不过 300 年的发展，较诸人类 400 万年的历史，实际上非常地短。假如人类发展到公元 3000 年的话，观点就会不同了。从人类的文化史来看，西方社会当然不是人类永久的主流文化，他只是个很短的主流文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是所谓的“产食革命”，能把自然界的東西变为人类所有，驯“野生”为“家生”。如果不能把野生的动植物变成家庭驯养、种植的，那么人类永远是处在蛮荒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程度绝对不比现代科技发展逊色，它是这么关键。但是在这“产食革命”的过程中，西方的种族对此毫无贡献，世界上有 7 个所谓产食革命的中心，没有一个是出现在西方；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西方绝不是文化主流，也非文化发展关键。我们并不知道，公元 3 000 年究竟是哪一个民族会成为文化的主流。从长远看来，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合一的文化，绝非特定某一民族的文化，绝没有哪个民族较优秀。

比如说最早的 7 个产食中心，有一个是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萨达姆是坏蛋，但他的国家却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在伊拉克的北边，土耳其的南边，两河流域最上游的地方，是最主要的一个豢养动物、种植植物的地方，大概在距今 1 万年前，开始种植现在的大麦和小麦，最后养马和羊。第二个产食革命出现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种植小米和一种黍类植物，开始养牛、及其他也许包括鸡鸭一类的

动物。第三个中心，是在长江流域以南，到今天的中南半岛一带。这一带种植稻米，猪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东非洲，是产食革命另一个主要发生地，他们种植高粱，豢养东非洲的牛。这是四个旧世界的产食革命。

一般人总以为，新世界在白人移入以前，是完全没有文明的。这是错误的。新大陆在白人移入以前，有 3 个重要的种植中心。第一个就是墨西哥的玛雅文化，玛雅文化的贡献是种植玉米，他们也种南瓜、种豆子。此外，他们豢养一种旧世界没有的东西——火鸡。其次，玛雅以南，在秘鲁一带有所谓“印加文化”。印加文化发展什么呢？他们种植现在的番薯、红薯及树薯。他们也豢养两种旧世界没有的动物：美洲驼及美洲羊。番薯在人类食物史上是很重要的，麦子、稻子都需要很好的环境才能生长，番薯却对生长环境不苛求。它在湿地、沙地都能生长，饥荒时是救命的关键。这是印加人的一大贡献。

附带补充一点，长江以南种的块根植物是芋头，所以是 Local 的植物。番薯才是 400 多年前移入的外来者。所以用“芋仔”比喻外省人，番薯比喻“在地人”，在人类学家眼中是很可笑的。

因为芋头才是本地植物，番薯反而是外来者。

言归正传，第七个产食革命的中心，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他们种植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向日葵，向日葵的葵花子摘下来磨成粉做馒头很好吃。当地的印地安人，就是种植向日葵。

以上的叙述，目的在以实例说明：种植作物，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关键。在此进程中，现代的西方人对此毫无贡献，他们当时还处在野蛮时代。所以，不能说哪一个时代是文化的主流。人类的文化常因环境而变迁，公元 3000 年，说不定文化的主流会在非洲大陆。我们必须了解，能有现今的西方主流文化，是奠基于早期的七个产食中心；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文化贡献，才有现今的文化。这样的一个观点，是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

在此我要插入一个小故事，是有关人类前途的探讨。1 万年前，在小亚细亚开始了大麦、小麦和种植。一直到今天，小亚细亚的南边还采得到两种小麦的野种：Emmer 和 Ancin。1 万年前的当地人就是采这两种野种小麦回家培植，慢慢变成家生的小麦，再逐渐繁衍出几百种不同的品种，Emmer 的染色体有 7 对，Ancon 的染色体是 14 对，而当初最

早的家生小麦的染色体竟然有 21 对之多！1 万年前当然不可能有像台大农化系的实验室，居然能够把两种小麦的原种交配繁殖成家生的小麦，这是非常神奇的。家生和原生的小麦最大的不同，在于野生的小麦成熟后，麦子的穗粒会一颗一颗地掉落在地，那么一天不过捡收几千粒麦子。但是家生的小麦成熟后，麦子的穗粒不会一颗一颗地掉落下来，便可以很轻易地用刀石割下来收成。为什么野生的小麦必须掉麦粒呢？因为野生的小麦必须自我繁殖，借风的力量把成熟的麦粒送到远方来繁殖下一代。反观家生的小麦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繁殖的目的。人类把家生的小麦带回选种，再重新种植，借此小麦可以散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须凭借风力散播，这就是关键所在。

我们为什么将植物的繁殖叫做 cultivation？因为 culture 与 cultivate 是起于同语源的，只是一个名词，另一个是动词。所谓家生的小麦是因为已经“人工化”，完全掌握在人类的“文化”控制下，除非经由人类协助，否则无法自行繁殖。相同地，动物在经过人类豢养之后，也会失去野外求生的能力。家生的小麦虽不用自力繁殖，但依赖人类的结果，就是整个被人

类所控制；野生的植物对人类较无助益，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散布开来。

由此可以窥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类种植植物，是把它家生化了。人类自从下地、制造工具、开始有了文化以后，是否也把人类本身家生化了？我们掌控家生植物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是否也把我们种族自身约束在文化的范围内？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创造出一条小麦的发展道路，可以创造出所有家生动、植物的未来道路，但谁来引导人类的前途呢？我们已经把人类家生化了，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繁衍；人类主宰了动植物，那么谁来主宰人类呢？

只有我们自己。这就是整个人类前途之所系，我们自己豢养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指定我们的道路。但我们却自己走进了“特化”的道路。特化，是一条迈向灭种的道路。若要不特化，就必须拥有“一般的适应”。“一般的适应”，就是要拥有更多的“Variety”，更多的种族特性，不单单只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的特性。更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的表达。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标榜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意见”的人类学基础。“多元”这两个字不是政治家宣传时才用的口号，不是

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一种意识形态的论题，这个“多元”是人类文化应有的科学根据。人类把握自己前途的方法非常清楚：不使人类走向特化、维持多元、不同的意见、保持 Variety，以便当环境变迁时能够有些储存的因子，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出现而存活下去，不致走入特化的死胡同。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人类学对于全人类的理解，就有一套很清楚的观念，倒过来思考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既然我们不但将其他生物，也将我们的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就应该愚昧无知地随波逐流，而应该要好好地思考如何去发展我们的未来。这些根本的问题是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部分的命题，是谈到更重要的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每一个名字都有很不同的发展。人类学者把握了 4500 多种人类文化的资料。所谓 humanrelation areafiles，我们在这些不同的资料里，找出了各种不同文化的歧异，并欣赏它的 Variety。有 Variety 才有能延续文化发展的基因。在文化的发展里，必须要有这些不同、这些歧异，我们才能保证不会走入特化。但人类各文化间，常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不同风俗而彼此歧视、讥笑或压迫，



导致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不同省份的人彼此嘲弄、攻击或产生偏见，殊为可叹。

文化之间差别经常很大，但经过理解之后，却往往很有意思。举例说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有一种习俗叫做“产翁”，当太太生完小孩——尤其是第一胎之后，太太就出门去上工了，反而是先生留在家坐月子，1个月不能出门，别人也不能来看他。所以我们叫他“产翁”。这种风俗对华人来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应该是太太在家调养，吃麻油鸡才对。太太生产，先生有坐月子的必要吗？当然没有必要嘛！人类学家最喜欢这种奇风异俗，并不是喜欢他的特别，而是希望在他的特别之下，能够理出一些头绪，阐明他真正的意义。这种“产翁”的习俗对人类学家来说，不但不奇怪，而且很合理。妇女生完小孩虽然会虚弱一些，却也不一定是那样虚弱，很多民族的妇女生完小孩就去工作了，她们也一样很健康。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妇女产后虚弱的问题。其实坐月子不仅是关心产妇生产后的健康问题。在研究中发现，坐月子，也是妇女借以获得家庭中尊重与奉养的时机，具有其社会上的意义。

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不认为妇女的生理问题如此重要，他们比较重视的是社会意义。一个男人在家庭里开始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由一个没有什么责任的人过渡到必须肩负家庭责任的人，心理上的调试殊为不易。“产翁”坐月子的设计，即在于利用这一个月作为缓冲，以便于男人调试心理，成为对家庭、社会具有责任感的“成人”。在1个月之后，再用盛大的仪式将男人的新身份——父亲——昭告全村。在阶段的转换上，仪式是很有用的办法，比如说很多种族中都有的“成人礼”多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透过文化的内在意义来了解所谓奇风异俗，经常会有恍然大悟之慨。

我们中国文化，也常会使用这种“失控转换”的方式，来分隔前后两个阶段。这是人类文化中很特别的一种办法。因为时空实际上是连结在一起的，人类却用“象征”将它划分开来。二三十年前，我曾带学生到埔里进行一次大型的调查，那次的调查是关于一个祭典。闽南语叫“作醮”。作醮有很多种周期，最长的是60年一个周期，也有30年、5年、3年一个周期的，甚至也有不定期举办的。当村落里发生灾害，诸如火灾、瘟疫、或是重大的事故时，就举行作醮。

因为他们想摆脱以往不好的阶段，进入一个好的、繁荣的阶段，所以，要在宗教上举行一个作醮的仪式，利用这个仪式，将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切开来。让后一个阶段有新的发展。这种文化的设计，在每一个民族中经常出现。用以转换时空，使新阶段到来。在新阶段和旧阶段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分界的阶段，他们就规定，在仪式的前三天，绝不能杀生。全埔里的人大家都斋戒茹素。这三天就用“干净”、“空白”的办法，来分隔新旧的阶段。在那三天内，市场里看不到鸡、鸭、鱼等荤食的踪影，以期顺利地完仪式。但是在这期间内却产生了不幸的事情，传说——我们没有去看，也不必去看，但这传说却一直存在——有一个外省人——请注意，他一定是一个外省人——以杀猪为业。他不参加拜拜，所以他照常杀猪，照样吃猪肉。不论传言是真是假，它已经传开了。第三天就传出那个外省人的手指已被砍断的消息。虽然真假难辨，但站在人类学家的立场，却很容易理解。传说与族群的差异，就在此出现。如果大家可以从

文化的角度去了解，“不杀生”只是一个“象征”，与印第安人“产翁”一样，都是一个分隔时空的仪式，一个让旧阶段过渡到新阶段的手段，一种象征手法，就不会有这样的谣言，也不会产生族群的冲突和误解。如果一般人能够像人类学家一样心平气和地去看待这些所谓的“奇风异俗”，也就不致视其为迷信，反而能加以欣赏。若大家都能互相欣赏，偏见和误解就不存在。

人类学家不但认为全世界的民族没有智愚之差，也认为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其文化特色。保存这些文化特色，是人类必然的责任，以避免走入特化的死胡同。要避免人类族群之间产生误解，就应当使他们了解这些人类学的观念。对于全世界人类的理解与关怀，正是一个21世纪知识分子，必然要通过的一个关口。

作者：李亦园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10期

美国大学课堂的契约精神

对于中国学生，Syllabus 是个很陌生的名词，而它却是美国大学课堂中的核心内容，既是一门课程的说明书，也是一份契约，规范教学进程，同时保护老师和学生双方的权益。

四年半前我初来美国，时差还没倒过来便参加了所在的利伯缇大学 (Liberty University) 的教学培训，开学后将负责教授本科生人际交流和公共演讲基础课。负责培训的教授很干练，有多年教学经验，警告我们这些新手不要想着跟学生做朋友，要保持一种职业的师生关系。她拿我做例子：“杜刚从中国过来，在美国没有朋友，他可以去自己的学生中找朋友吗？当然不可以！如果你们不想找麻烦的话。”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我稍有些尴尬，不过这个道理我明白，毕竟来美之前我已经做过三年教师了。接着她说：“况且你们已经有了最好的朋友，它叫做 Syllabus (课程纲要)。”大家心领神会地笑了，我却不明所以，随着大家笑笑。我的不明白不是这个词的词义，而是对它的含义陌生，因为这在我国内大学的教育中没有接触过。

即使这个概念再陌生，过了第一周也会明白个大概。开学第一周被称为“纲要周” (Syllabus Week)，第一节课前就会收到各科教授发来的纲要，我也按照要求将所教课的纲要发给了学生。于是第一节课除了师生互相认识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共同研究该科目的纲要。课程纲要大同小异，少则一两页，多至十几页甚至更多，有相似的结构和元素，包含教科书目/阅读书目、学习目标、成绩结构、评分标准、功课任务及具体要求、学科政策 (包含考勤、迟交功课等)、学术政策 (处理作弊抄袭的政策等)、学校资源 (比如写作辅导、心理辅导等) 和时间表 (包括每课内容、功课截止日期) 等。

从纲要内容来看，它很像一件产品的说明书，告诉学生怎么上这门课，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做，怎么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样学生和老师对这个科目的理解就能在同一个层面上，避免了很多因要求模糊造成的问题。所以第一节课，作为老师的我们会跟学生强调，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先查看纲要，找不到答案后再来询问。我在国内读大学时，没有任何一门课有这



样的文件，可以清晰地告诉我那门课的期望和标准，大部分相关事项都是老师第一节口头讲述，难免会有很多重要信息缺失。后来和一些朋友交流，得知几所国内名校的少数课程确实提供了课程纲要，这些课程以外教授课为主。

纲要不仅仅是一份说明书，而且也是一份契约。当我在第一所大学教传播学基础课时，课程纲要最后一页是一份合同签署页，上面写着：“我已经阅读和明白这份课程纲要的内容和这门课的要求、期望和政策，而且我会遵守以上要求。”然后学生要签字交给授课老师。这就是培训时教授说它会是我们好朋友的原因。假设在学期中学生因为一些问题要挑战老师，比如迟交作业，老师可以简单地说，“纲要已经写明白了迟交作业是0分（或者是其他评分标准），并且你也签署了合约，这表示你知道并接受这样的政策。”现在我在的乔治梅森大学，传播学基础课主任每次培训时都会一再强调：“课程纲要可以保护到你们，只要你们坚持上面的要求，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作为一份契约，保护的不只是甲方，也包含乙方，也就是说纲要同时需要保护学生的利益。比如纲要上已经写明了学期当中要完成的功课，老师就不能随

便再加别的任务。学生知道他们这门课要写几篇论文，甚至知道每篇要写几页。如果老师心血来潮做出改动，学生就可以拿出纲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作为甲方的教授，通常会在纲要的末尾留一行字，阐明保留修改纲要的权利。比如我在用的课程大纲末尾就有这么一句，“你的老师保留在学期中修改纲要的权利，并可无需通知。”

然而这行字并不是赋予教授“独裁”的权利，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险起见，在极端情况下（与学生的纠纷升级，牵涉到家长或者上级领导）可以保护自己。通常教授不会随便行使这项权利，因为他们明白纲要的契约性质，因而学期当中的一些改动都会取得学生的同意。这种契约精神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契约在美国政治、经济以及生活当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人们对契约尊重和遵守的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形成一个有良好关系的社会。

作为一份契约，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一种自愿选择的关系，课程纲要也不例外。开学头一周学生可以试听感兴趣的课程，只要在截止时间前决定好即可。如果他们去了一门课的第一节，通过课程纲要发现不理想，或许因为老师功课太多，或许课程内容与预期不同，或许

只是不喜欢老师，就可以选择不去上，不用和这位老师建立契约关系。当然有一些核心课或必修课，学生的选择不多，但是这种必须上某门课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我们也知道生活中的契约也不是百分之百自愿，比如我们要安装一个软件，使用一个服务，我们面临的选择可能也不多，这时我们也要“被迫”接受条款。

那么中国大学教育能否也使用契约来规范教学以及保护师生权益呢？首先要看中国社会的契约文化的成熟度。经过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国内经济方面已经普遍接受契约制度，形成了较成熟的契约文化。相比之下，政治和生活方面这种文化还只显雏形。另外，中国文化赋予老师与西方社会中教师相比不同的地位和角色，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老师仍是“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师者，而西方教育受到消费主义和商品经济影响和改造，教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知识服务的提供者。因而，契约这种商品经济色彩浓厚的东西来到中国，遇到有着文化赋予的绝对权威的中国师者，恐怕会水土不服。

不管如何，在我这三年的教学经历中，课程纲要确实成了我的好朋友。很多次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有挑战性的情况，比如学生晚交作业，缺勤，或者错过演讲日期，我都可以根据纲要做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处理方式，这样保证了课堂的公平。上一个学期一次演讲后，有一个学生向我抱怨，因为她的着装我扣掉了一些演讲分数。她详细地跟我讲述她是如何努力找合适的衣服，也照过镜子觉得没问题，为什么我还要给她扣分。我说：“首先，你的衬衣合适，但是穿一件短裤演讲怎么都算不上得体。”她听了说：“可是这是一件比较正式的短裤啊，我认为合适，我的室友也这么说。”我听了没有办法，只好请出我的“好朋友”，找到描述演讲着装的那一页，然后把相关要求读了一下。她听了耸耸肩说：“好吧，我没有看到。那我没问题了。”

作者：杜玉翔

来源：《中国教育研究》

史苑钩沉

燕南园 60 号的家族记忆（上）

燕南园 60 号，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生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精英。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燕南园 60 号，中国现当代语言学一代宗师生王力先生曾经的住所。他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长子王缉志成为了四通集团创始人，小妹王缉慈是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的退休教授，王缉思是曾经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三子王缉宪则是香港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燕园的地图摊开，就是一个家族的记忆。

从越秀山到燕南园

1938 年，从巴黎回国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王力先生随校来到了昆明，王缉志就出生在这里。

父亲王力是广西人，王缉志出生在昆明，童年时期在广州，此后一生都在北京度过。四地串起了王缉志的人生版图，连他自己也笑谈：“真是身份复杂啊。”

1945 年，4 岁的小缉志该上学了，可他怎么也不肯和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一起上幼儿园，“我母亲当时是小学一

年級的班主任，我偏不肯上幼儿园，没办法，他们只能让我去我母亲班里上课。”

一年之后，王力先生赴岭南大学任教，一家人迁往广州。已经念完小学一年级的王缉志参加了小学二年级的入学考试。毕竟只有五岁，考题的难度显然超出了小缉志的掌握范围。当时考试有规定，不会写的字可以在方格纸上画圈圈代替，王缉志就认真地在每一个方格里画上了圈圈。当时，王力先生就在玻璃窗外看着自己的长子“认真答题”。

“我父亲看我一直在写，还以为我答得挺不错的，他都不知道我一直在方格子里画圈圈。”七十多年过去了，谈起当年的那场入学考试，王缉志还是为自己的机智举动忍俊不禁。

“大概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吧，虽然我画了那么多圈圈，还是被录取了，后来也就慢慢跟了上去。”王缉志就此在广州度过了整个童年与少年时期，一直到 54 年院系调整，随父亲北上来到燕园。

五四、六、二七、廣州



(王力一家 1954 年于广州合影，右上为王缉志)

1954 年 8 月，王力带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王力最小的儿子王缉宪出生。一家人起先住在临湖轩，后来搬入朗润园，1957 年入住燕南园 60 号——如今的工学院办公基地。

直到 2003 年王力夫人夏蔚霞去世，子女把小楼交还给校方，这座小楼与这个家族的缘分，延续了整整 45 年。

一楼一院一家人

搬入燕南园的那一年盛夏，16 岁的王缉志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是当时班里最小的同学。因为作息时间不同，王缉志搬入了集体宿舍，就住在 28 楼，房间朝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燕南园的家。彼时的燕南园可谓卧虎藏龙，林庚、冯友兰、马寅初等等大师汇聚于此。有传言称，当时在青年教师中流传着“奋斗三十年，住进燕南园”的说法。

王缉志的母亲夏蔚霞做的一手好菜，平日里有保姆负责做饭，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母亲总是要亲自下厨，做一桌好吃的。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道蚂蚁上树，把粉丝过油炸，再放肉末下去炒，非常香。”据王缉志回忆，当时离得最近的住户有北大副校长周培源，校长陆平等。“当时父辈间的走动比较多，我们都是一群小孩一起活动。”

王夫人也很爱花，已故中文系教授、52 号楼的主人林焘曾撰文回忆，当年她在楼前的走廊上摆满了花，草坪上也开满了花，尤其是楼东南角那株蔷薇顺着墙爬到屋顶，长成一棵高大的蔷薇树，每年春天满树蔷薇，成了燕南园一景。每年百花盛开的时候，夏蔚霞总是摘一些花送给自己的邻居。

冯友兰家的女儿总是会到王家的院子里赏花，回忆起燕南园的生活，她还记得“王家的花总是开的最好的”。这位当年爱在园子里赏花的女孩子，名叫冯钟璞，走出燕南园，也许她的笔名“宗璞”更为人所熟知。

如今路过燕南园，看到 60 号院子里繁花密布，应该有不少是当年王夫人所手植，繁花犹在，故人已去。好在她后来的主人也尽心打理，不至荒芜。



当时，家里的电视机是稀罕物件。1961年26届世乒赛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去燕南园家中观看电视转播，40多个人挤满了客厅。王力先生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全家人和40多个同学一起观看了比赛。这段故事，直到50年后数院百年院庆的同学聚会上，仍然频频被同学们念起。

至于平时，王缉志对于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那个伏案工作的背影上。60号的小楼里有王力先生专属的书房，夜里灯亮到几时，王缉志也记不得了。“因为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次去睡时父亲都还在工作。老一辈学者的勤勉我们真是比不上，”王缉志感慨良多。

燕南园60号书房的灯一直亮着，哪怕是动荡的十年浩劫中也少有间隔。在灯下，王力写成了《汉语史稿》、《汉语音韵学》、《汉语诗律学》等著作，由他主编的《古代汉语》更是进入语言学研究领域绕不开的教材。

“从某些角度上看，我的弟弟缉思更像父亲，他在学术上的勤奋继承了父亲。”这位被王缉志夸为“勤奋继承父亲”的弟弟，正是曾担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九年之久刚刚卸任的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这个家族由燕南园60号开始的北大情缘依旧在延续。

一个家族的信条

王家的教育模式是典型的“父慈母严”，王缉志小时候可没少挨母亲打。

“我小时候学钢琴一半是被逼着学的，每次不听话不练琴，母亲的棍棒就准备好了，免不了一通打。”说起儿时的调皮事来，王缉志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当年还跪过搓衣板呢。”

王力先生当时忙于语言学研究，没有很多时间管教孩子，但对孩子们的影响却依旧很大，王缉志说这就叫潜移默化，言传身教。“我们写文章一定不会有错别字，不会有语句不通顺的，无论写文章还是讲课，都注重严谨、逻辑清晰，这都是来自父亲的影响。”

王力先生也并不是永远温和，在一次王缉志犯错后，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在背上留下了五个指头印。犯错的原因早已淹没在记忆的洪流里，只记得“我母亲在一边打趣说，看来你也不是真的慈爱教育，而是平时没空管嘛。”

王夫人说得不假，在王力先生忙于学术的日子里，她对这个家庭，对这几个孩子有着更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诚信。

“如果说我母亲对我们兄妹几个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对于诚信近乎苛刻的绝对要求。”在今天，使用单位里的信封似乎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了，可是在王缉志母亲看来，这却是关乎人格的大事。“有一次在家里用单位的信封，母亲见了非常生气，她认为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哪怕再小也动不得。”一个信封的小事，王缉志记了几十年，并成为了整个家族流传的信条。

在王缉志的记忆里，无论父亲再忙，孩子们的学业再紧张，每到周末，一家人还是会走出燕园，一起去“搓一顿”。

“有时候也会去颐和园划船，我划桨，父亲就在船上坐着。”

王力先生在结婚 45 周年时写了一首诗给夫人，也是这老两口一生的诗意写照：

“甜甜蜜蜜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
七省奔波逃猱狖，一灯如豆伴凄凉。
红羊溅汝蛟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
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

当年嚷嚷着“奋斗三十年，住进燕南园”的年轻人们也不会想到，三十年后，他们等到的是一位位大师离去的背影和燕南园神话的凋零。

文章来源：北大青年

李可纯 光华管理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陈祎 中国语言文学系 2012 级本科生

鲁迅设计北大校徽：一半哀伤的脸 一半哭泣的脸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话也同样适用于学校。一届一届的学生怀着崇高的人生理想来了，又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去了。校园生活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是短暂的几年，但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终生无法磨灭的。



尽管每个人的经历各异，但是在回忆学

生时代的时候，有一件东西想必是最难
忘怀的，那就是校徽。

北大的校徽颇有特色。那是一枚圆形的徽章，中间是由“北大”两个汉字组成的图案。这两个字本来笔画就少，构成的图案也相当简洁，不过是把字体稍稍做了一点变形处理而已，似乎谈不上有什么超凡的设计技巧或深奥的寓意。

——但是，如果细细品味一下，难免会让人悚然一惊：那拙朴的图案分明是一张哀伤的脸、一张哭泣的脸、一张充满悲愤与绝望的脸！低垂的眉梢与眼睑，下撇的双唇及嘴角，略视似有，详审若无，在这或隐或现之中，形成了一种奇特而强烈的视觉效果！

是谁有如此怪异的思路，居然把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的校徽设计成这样一张惊世骇俗的脸？

是鲁迅。



他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其中“蔡先生”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大学”则是北京大学。1917年8月7日就是北大校徽问世的日子。

不过，一直到这时，世上还并没有“鲁迅”，而只有“周树人”。

那时，周树人与蔡元培已是多年的至交了。五年前，正是由于蔡元培的缘故，周树人才来到了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2月，应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邀请，周树人离开绍兴赴南京至教育部任职。后因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而由袁世凯继任，政府地点定为北京，周树人也随教育部北上，于5月5日到达北京，暂时在骡马市的一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就迁到了山会邑馆也就是后来的绍兴会馆居住。会馆里住的都是同乡，要方便得多。

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路西，大门朝东，门两旁卧着一对石鼓状的门墩，门额上悬着写有“绍兴县馆”四个大字的木匾。会馆规模不小，大大小小的纵横数进院落，八十多个房间。进大门绕过影壁后，正对着的前厅是供奉先贤牌



位的仰戴堂，后厅是供奉文昌魁星的晞贤阁，其他的大部分房间则是供乡人居住的。周树人被安排住在会馆西北侧名为藤花馆的第二进院子中坐西朝东的一排屋子里。安排好住处以后，他才搭骡车前往位于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去报到。

初到北京时，有许多事情要做。蔡元培是一位颇有抱负的教育家，无论是政治见解还是学术研究，都与周树人极为相投，周树人视其为知己，在工作上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在刚到北京就职的头几个月，政局就发生许多变化。仅以教育部而言，总长蔡元培因痛恶袁世凯的勃勃野心，于6月断然辞职。周树人深为惋惜，数次前往蔡元培家中探访，挽留无效，只能含痛作别。尽管世事浊恶，他却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因为他还负有资助兄弟、赡养老母的重任。他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忍受！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中国社会面临着剧烈的动荡：

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若干小党组成国民党，在首届议会中占多数。

1913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遭失败。

1914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而黄兴等人因政见不同拒绝入党，造成革命党的组织分裂。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各省纷纷独立，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忧郁绝望中病亡……刚刚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中国，就这样又陷入连年的动乱之中。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

周树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易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在他13岁时，祖父因科举贿赂考官案被捕下狱，父亲也被连带革去秀才功名，并从此不许再参加科举考试，原本热闹兴旺的家庭遭此沉重打击，立即陷入困顿。更不幸的是，父亲愤怨成疾，竟至一病不起，耗尽家产也未能挽救他的性命。家庭的破败与族人的非议，迫使刚刚成年的周树人带着母亲勉强筹措得来的八元川资离家求学。继而东渡日本学医，以求掌握救人之术。一次，在课间观看的幻灯片中，居然看到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一个中国人因“俄国间谍”的罪名被绑了，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来



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竟也同样是中国人！这使他深受刺激，竟愤而退学，弃医从文，毅然投身于振兴文艺运动。然而，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所造就的中国人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也正是在那一年，周树人奉母亲之命自日本匆匆赶回故里，与素不相识的朱安结成夫妻。结婚当夜，他俯首案头读书；第三天便搬到母亲房里；第四天，则启程重返日本。这毫无感情的婚姻也许会永远像枷锁一样套在脖子上，使他终生无法摆脱！他曾经以笔为戟、振臂呐喊，试图唤醒国人去摧毁那万恶的旧制度，何曾想到自己也无法冲破这旧制度的压迫而不得不默默屈服。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当感到愧疚还是愤怒！

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大多让人沮丧、绝望。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也曾欢欣若狂；随蔡元培的教育部来京，也曾想做一番事业。然而，清朝虽然被推翻，终年战乱仍使百姓不得安宁，腐朽的官场更令人窒息。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在这腐朽中挣扎下去，但那苦闷、

消沉的情绪如巨石般压在心头，使他始终沉浸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

几年来，他靠抄录、研究佛学典籍、古碑拓片、线装古籍等来麻醉自己的灵魂。甚至在旧历除夕，他也是独坐于煤油灯下，抄录碑帖，对窗外的爆竹声置若罔闻，全然没有一丝过年的感觉。才三十多岁的周树人，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已经死了。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政局有一定变化。在诸多社会名人的极力推荐下，1917年1月，由国外归来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之始，他便立即开展大刀阔斧的整顿与改革。首举之措，就是果断吸收进步学者，大力充实教员阵容，并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因此，由陈独秀担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接着，蔡元培又邀请诸多思想激进的名人进入北大，并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用各有所长的学者。北大校园立时成为人才济济、思想活跃、充溢着革新之风的理想之地。蔡元培与周树人是多年至交，刚回到北京便与周树人联系，周树人也立即前去蔡元培住所拜访。为支持蔡元培的改革，周树人介绍自己的弟弟周作人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到北大工作。当年4月1日，周作人抵达北京，也住进了绍兴会馆。

这时周树人已经迁到会馆里的补树书屋居住。

本文摘自《风范：北大名人故居及轶事》，

肖东发 陈光中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

■ 大美北大

静园



静园位于南北阁与二体之间。六院曾经为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楼，现在六院经过改建整修，逐渐成为一些院系研究所的办公所在地，现在要在静园上建设燕京学堂。

这六座庭院跟燕园里别的风格特征有所不同，精巧玲珑，幽静典雅，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像是古代富贵人家千金小姐的绣楼。一至六院的布局也别具匠心，它们与二体构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文物布局，而又分布在燕园南北次轴线的两侧。

燕园初建时，最初只有四座院子，分别名为“敬斋”、“业斋”、“乐斋”和“群斋”。也就是现在的一院（业斋）、二院（敬斋）、四院（群斋）和五院（乐斋），原为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建于1926年。据冰心回忆，当时的四个庭院内并非全是学生居住，还有部分燕大女教师也居住在这里。而且每座庭院中还有自己的食堂，女生们都是自己动手淘米做菜，然后在干净明亮的餐厅里集体进餐，女教师们有时也会和同学们在一起用餐。冰心先生在《未名湖畔的三年》一文中写道：“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



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和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由此不难想见师生共聚一起，其乐融融的场面。

虽然当时的燕大是男女同校，但校方还是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制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除了每年一次的开放日外，男生是不能随便进入这四个院落的。女生在晚上的特定时刻以后就不能出去跟男生约会。正是因为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约束，这四座庭院就被燕大男生戏称为燕园里的“紫禁宫”。等到每年一次的开放日来临的时候，校园的气氛就变得活泼起来了，平日里显得幽静的庭院也顿时热闹异常。男同学们会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参观女生的宿舍，而女同学们也会大大方方地把他们迎入庭院，并亲自下厨招待这些平日很难进入“紫禁宫”的男同胞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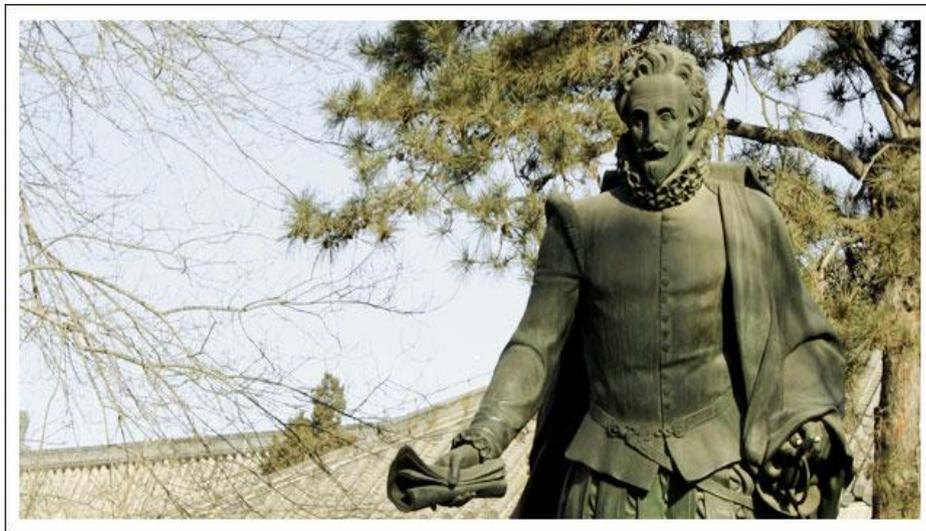
1952年秋季，北京大学迁至燕园。加建了三院和六院。2005年4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夫妇参观北大校园时，曾参观静园六院，因连战母亲赵兰坤女士在北大（原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就住于静园六院中的一院。

六院从整体上看似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房间均为木制结构，雕梁画壁，古色古香；各有精巧灰顶红色小门楼一座，由灰色石砌虎皮矮墙联成一体。每座院门都有紫藤萝花架，每年5月，紫花缀满门楼，颇为典雅幽美。这是大同之处。但如果进入庭院中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座庭院的都有自己的特点，内部结构多不相同，每座文物的门窗不仅形态各异，而且花色不同，展现出我国传统的木工雕刻艺术的丰富多彩。这似乎也体现了“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范，避免了“千人一面”的雷同感。

由六院和一体所围成的区间原为疏林草地，点缀着藤萝花架，如今这里的静园成为师生们课余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静园草坪是目前燕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坪。春秋时节，和风煦日，这里是很好的休闲之地。同时，它还是北大师生们一个重要的课余活动场所，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文艺晚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摘自 北大网页

塞万提斯像



塞万提斯像矗立在北京大学勺园荷花池北侧的草地上，北京大学校史馆的西南方。该像为铜制塑像，高 2.35 米，塞万提斯身着西班牙披风，右手持书，腰挎宝剑，目视前方，风度威武而潇洒，既散发着文学骑士般的无畏气质，又闪耀着理想主义者的智慧之光，时时吸引着无数学子深深注视的目光。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唐吉珂德》的作者。出生于西班牙中部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经历了飘零的童年生活，曾在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里当过士兵，参加了西班牙、土耳其联合舰队之间著名的勒颁多大海战，左

手致残，归国途中曾经被俘，获释以后以文学创作为生，写过剧本和诗歌，最终以《唐吉珂德》开创了西方近代小说的先河，他自己也自称为“唐吉珂德的爸爸”。

1616 年 4 月 23 日，塞万提斯去世，被草草埋葬，甚至没有立下墓碑。直到 1835 年西班牙政府才在马德里的西班牙广场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的上端有塞万提斯的石雕像。1986 年北京市与西班牙马德里市结为姊妹城市，之后，马德里市政局特意复制矗立在该市区广场的塞万提斯像，赠送给北京市民。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它安放在北京大学校园。1986 年 10 月 3 日在北大举行了安放仪式。

摘自百度百科

学员心声

梦里话

树上的枝儿长了新芽，路边的枯草也变绿啦，远处的油菜也开了花。林荫道上的鸟儿又开始了叽叽喳喳……

冬还没过完呢，春就来了，时间是有多快啊，话还没说完呢，门就被关上了，现实是有多无奈啊。

想找条路“回家”。却像一个被抛弃的可怜娃娃，在路上使劲挣扎。用双手轻柔眼里的沙，生怕眼角的泪水会下滑。无法掌控路程的误差，只能在铺满荆棘的道上慢慢地爬。速度像蜗牛搬家，距离越拉越大。不想在半路停下，因为害怕，害怕一不小心就会离开了的她。

用笔在纸上拼命的画，画了又擦，擦了又画，希望能画出个完美的它，然后将它往心里儿挂，永远都不要摘下。能否记得当初说过的话，还有那带着香味的油菜花。一同捎去当做牵挂。

狠狠地在键盘上敲打，将所有的爱

和恨一起交叉，对比出昨日的笑话。与往日的同窗一并玩耍，忘不了那时班主任的一声“啊”，吓的连书本都要掉下。纵观世界变化，还有那永远都不会变多的工资卡，不由得潸然泪下，把所有苦楚都往心里加，让其自燃、爆炸。

屏幕前的影子渐渐淡化，似乎没有了之前的浮夸。那些祝福的话该如何表达，静静的观察，默默的惊讶。是不是还要带着泥土埋进沙。

再见了你的温柔细发，分别时定会心如刀割。雪中花，梦里话。留得住一世繁华，却留不住你似水年华！

作者：杜宇成

深圳学习中心 2013 年圆梦计划

我的中国梦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从童年、少年、青年一直揣在怀中，它像一盏明灯，照亮心房，指引道路，在风雨兼程的路上，为我们一路加油！

此生有幸做一个中国人，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我的血液里澎湃着北海的浪涛，我的脑海里延续着清明上河图的盛景，我的脚下踩着秦皇汉武征战过的土地，我的嘴里依然诵读着唐诗宋词。

我陶醉着，几度思沉，我仿佛穿越了历史，神游于故国，我站到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麾下，成为他们的战将，为强大的中国梦而征战。看吧，霍去病正挥动大刀冲入匈奴敌阵，在可歌可泣的那一瞬间，我力盖山岳，驰骋于救国的历史关头。马蹄声去，蜀汉的战车呼啸而来，关云长力挽狂澜，横刀陷阵，一代英豪在滚滚江水中被历史颂尽风流。我亦在此，壮丽的史诗催长着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斗志激励着我翱翔历史，我冲锋于紧急的历史关头，看，“岳家军”正挥师北上，直捣黄龙，刀光剑影战马嘶鸣。文天祥在我耳边喊出了“状元宰相绝不投降”的硬骨气概，我仿佛看着他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气千古，引领后人竞折征战。朱元璋、郑成功、康熙大帝，伟业让人痛快淋漓，直让我把头颅深深浸入历史的长河，痛饮！

战火戛然而止，袅袅炊烟从湖畔升起，水，异常平静，清晨女子淘米浣纱，幽扬琴声自林内传来，高山作背，溪水注湖，朗朗书声诵咏着人们最初的善良。觅进林内，老者对弈，才俊舞墨，闺女刺绣，孩童学文，老农出耕，房前屋后良田广阔阡陌纵横，一幅汉唐盛世的画景跃然眼前。我亦身临其境，读史论道，挥笔写下一段盛唐的章回。

如梦如幻，历史魅力让我徘徊于古今，我生于斯，长于斯，沾染过这里的晨露，痛饮过这里的甘泉，这里的上下纵横是我的一切，我深爱这里的一切。我爱你，中国，我为你陶醉为你清醒为你做梦，我梦着，我痛快梦着，我无比自豪地梦着。我们强大过，站在国土上，我多么渴望复兴，五千年历史，八千里云月，催促着我一个强大的中国梦。我渴望汉唐再现，国力辉煌；我梦想空海雄兵荡平南海，东平倭寇；梦想祖国把我带进理想的乐园，我想天是蓝的，水是洁的，人是和的，土是绿的；我也梦

想官员自律，人民操守，物阜民丰；梦想中国傲立世界，笑看四方来贺。

为了你，我愿奉献，我愿努力，我愿号召大家为你献上 13 亿份力。国家强大，我也强大，我深深以国家发展为荣，把自己融入祖国复兴的潮流。

作者：黄威正

深圳学习中心 12 秋圆梦深圳